读《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冯 尔 康

继《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之后，何龄修同志和张捷夫同志，王思治同志分别主编的第二、第三卷也同读者见面了。笔者欣喜之际，祝愿后续诸卷早日问世。

笔者打开第三卷，对有兴趣的人物传首先进行了阅读，看了《豪格》、《尼堪》、《孟乔芳》、《李渔》、《瞿式耜》、《郝摇旗》、《金声桓》等篇。这些人物的作者大多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传记写得很好，愿把心得写出来，祝以后写得更好。也把认为需要商讨的地方提出来，向作者请教。

上述传记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作者洞悉传主，写出其人的基本面貌。作者要把传主写好，首先得把它“吃透”，然后“吐”出来的，就是传主了。这种吃透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传主一生的了解，而不是片段的局部的认识；二是对传主的生活时代和具体生活环境的真正把握，而不是皮相的大而无当的浅见。《豪格》诸传的作者，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写作对象，对传主有了真知灼见，才形成文字，告诉读者。所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传记，既有其人一生的历史，又有周围环境，还使我们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如《豪格》传，作者叙述了豪格参加1627年的宁锦之战及后金军的残败，指出这次失利“对豪格以后如何与明作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书局1986年36页）迨到1633年豪格应皇太极之诏，奏言进攻明朝的方略，作者写道：“他从后金军毁边墙深入内地所取得的战绩，以及前此在宁锦坚城屡遭挫败的教训中，说明对明境应实行残毁的方针，并提出联络农民起主军从东西夹击明廷。”（37页）作者认识到1627年宁锦之役对豪格的影响，分析他的成长和后来的作为，这样通前到后地看一个人，把握了他的全部历史，写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做到在观点上前后一致，在行文上前后呼应。《孟乔芳》传，作者开头写传主少年时代，私离家乡，到京中游玩的放荡不羁的性格，后面写他任陕西总督，领兵征战，待将士豁达有度，培养出河西四将的张勇等人。掌握了孟乔芳不拘小节、识人爱才的性格，以此见解，写出这个人物。《郝摇旗》传的作者开篇写道：

>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群龙无首，郝摇旗乘机掌握了一部分军队，由不知名的偏裨成为一部的主将。当时，跟随李自成东抑的大顺军在连遭失利、地方政权全部瓦解的情况下，意气十分消沉。郝摇旗和其他大顺军将领率部转入了湖南平江、浏阳一带，陷于徬徨失所之中，先投靠南明督师何腾蛟，不久又在八月间向清政府递上了降表。后来终于在全国抗清斗争的推动下，坚定地执行联明抗清的的政策，成为清初农民军中著名人物之一。（410页）

把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的形势，郝摇旗的投靠南明、降清与抗清的变化原因，交待得清清楚楚，这正是作者对郝摇旗的活动舞台——1645年全国政治形势的了如指掌的反映。

其二，内容翔实。作者们按照“记事为主，寓论于史，少发议论”的原则，在有限的篇幅里，尽量叙述传主的事迹，不发表空泛的议论。笔者读的几个传，觉得写出了传主的主要

经历和事迹，有大端，有细节，清代人物传记向以《清史列传》为翔实，但《传稿》的豪格、尼堪两传内容都超过了它，可见本书容量较大。作者们多方搜集了传主的有关史料，融汇到传记中，而且对待史料比较严肃认真。笔者对《豪格》传中所引用的《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三十余条资料，与原书进行了核对，发现作者使用的资料符合于原著的意思，引文大多数无误，少量的个别的文字有出入，也无害于原意。

其三，寓论于史。前面提到作者们的这个原则，从实践结果来看，是实行得比较好的。几个传中都没有长篇的议论，基本上没有脱离事实的空论，而在必要的评议中，笔者认为大多是得体的，是简单明瞭的。如《瞿式耜》传，作者写明传主四代科甲之后，紧接着说它"对瞿式耜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无疑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296页）这是自然得出的结论，令人首肯。又如《金声桓》传写了传主起兵反清而奸诡暴虐无谋无信的事实后，指出"政治上的腐朽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反复无常的金声桓已经走上了绝路。"（426—427页）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就是有的传记文字写得很好，如《李渔》传，行文流畅，叙事有经，引人入胜。《孟乔芳》传也写得很生动，读来有趣。本书第二卷主编何龄修同志在《卷头语》中讲："历史人物传记有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属性。我们要求作者注意传记的这个特点，努力使传记的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结合起来。"这个高标准的追求令人赞佩，在作者们的努力下，无疑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了。

这些传记，在内容上，文字表达上，全书的统一体例上，愚意也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内容方面，适当的增添和减少，似是可以考虑的。《李渔》传，对传主的名、字、号罗列了十种，内中就有"笠翁"一字，这样写很必要。但是我们知道，李渔在世时就以笠翁名其书，死后为其立墓碑亦以笠翁为名，后世之人也多以此名代表他，笠翁成了李渔的通称，因此笔者以为在介绍了他的字号之后，指出笠翁是更为人称用的事实，以便于读者更容易了解他。李渔在《笠翁偶集》里有玩小脚的庸俗文字，缠足是中国妇女于百年凌辱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耻辱的标志，李渔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否可以提及呢？本传作者业已指出李渔"专门研究了女子的声容"，（260页）于此似可加上他于缠足的考察。《豪格》传所叙豪格历史，清军入关后的部分显得单薄，若把他在陕西、四川的军事活动稍微展开一点地写，是有点内容可以补充的。《瞿式耜》传对传主于崇祯元年就任户科给事中后对阉党余孽的斗争未作具体叙述，而《明史》本传则有相应的内容。崇祯初年反阉党是一件大事，瞿式耜的活动也适是以表明他的正直的政治立场和作为，是他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一定的笔墨，想来不是多余的。笔者以为，所需添加的内容，文字并不多，几个、几十个字即可，它不会大幅度增加篇幅，而可使内容更臻充实。

有些内容，此种性质的传记似乎可以不写或少写，以便省下篇幅。即如《豪格》传对张献忠的死亡有三百字的描写，又有同样文字的注释，张献忠败亡在豪格军前，但与豪格究竟是何关系，作者如果就此问题展开叙述是必要的，但读后令人感觉有点偏离论题；过多地写张献忠之死，在这里显得多余了。

一种规格的传记文，写什么，不写什么，应有的内容不可短少，不该有的事情就不让它出现，唯是，才能符合作者自定的程式，才能更好地给读者以预定的东西。这是衡量一部著作科学性的重要标尺。

文字的锤炼，是无止尽的功夫。名家都说文章要改个十遍八遍的，自然是至理高论，然而做到了又谈何容易！不过这并不妨碍读者有这个要求和作者以此自律。这几篇传记似乎都有需要修饰的字句，以便去掉繁衍枝蔓的文字和病句，使行文干净利索。如《尼堪》传："清太宗以对明朝积怨已久，倾所部亲征，尼堪随多铎军围其国王于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因兵力不敷，弃城遁去"。（119页）若在前一个国王后加"李倧"，倒可使读者先明瞭国王是谁，次后"朝鲜国王"四字可省，整个讲尚能减少两个字。又如《郝摇旗》传："南明皇帝赐郝摇旗名为郝永忠。"（410页）既然是赐名，并不包括赐姓，第二个郝字还有必要写吗？

有些字句不通顺，是引用古文带来的，因为把古文献的话与今人的话用在一起，很难都衔接得很好，很恰当。作者们有一条"尽量少用引文"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但笔者发现，有的引文并非没有它就不能说明问题，如《豪格》传的注七、八、四十、四十一、四十二等。不必要的引文，绝不会使文章增色的，想来我们是会有同感的。

引文多少是体例问题，本书还有一些属于体例运用的问题：

（1）古地名今注。有的传对清代地名作了今注，大多数传阙如。愚意为方便读者，以注明为好。当然，对古今同名的大地方可以不注，以免繁琐。

（2）明清纪年与公元对照。诸传对使用的明清纪年的年头，都换算公元年分注出，甚是。至于月日，有注的，有不注的，此处似乎可商讨。人物的生卒月日，宜有公元对照，发生在阴历十二月的事，换算阳历，可能要过了年分，此亦宜注明。

（3）注释详略。有的传记注释甚少。多少不是文章好坏的标准，以适宜为是。有的传记因注释太少，至令读者不知该传根据那些古文献写的，如果也研究这一问题，就不能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线索，对读者来讲不无是个缺憾。本书许多传记在没有引文而叙述事情的地方，也作注说明资料来源，如能都这样做，既表明传记有资料依据的科学性，又能满足读者的求知愿望。

（4）内容互见。有一事而涉及多人，自不必每人传记都详细书写，而把它写在事件最主要的人物传上，以免重复，这个处理原则甚佳，问题是该简略到什么程度。如《豪格》传写皇太极死后皇位继承问题，谓"事详《多尔衮传》"（43页）未说明豪格态度及结局，此事对豪格至关重要，若在此有结论性的说明，既使传记内容完整，也可免一些读者翻寻互见专之劳。

（5）传记篇幅。将历史人物依其地位，分出等第，给以相应数量的文字说明。有关规定，无疑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灵活掌握问题，因为很难说那人该写一万字，那人该是七千。而且有的人物很重要，该多写，但却没有那么多记载，硬凑一点，就没有必要了。

体例的问题，就着某一篇传记讲，破例是小事，但从全书看，就是体例不严谨的毛病了，似乎就值得注意了。

最后涉及一下观点的问题。《李渔》传的作者力求对传主作客观的辩证的分析，认为他"完全沦为封建帝王和官僚士大夫阶级的帮闲文人，其作品的格调也较前更为低下。""他对时憧憬着""奢糜生活，使尽浑身解数去讨好权贵。""其行经自不屑一顾。"同时认为他"把'士林所不齿'的'俳优"作为正当职业来看待"，"敢与封建正统观念相抗衡"，他的"戏剧观，无疑是进步的。"（260—262页）笔者觉得对李渔的批评不尽如人意。他并非宫廷戏剧家，如何说他成了封建帝王的帮闲文人？帮闲文人是政治概念，（下转第64页）

义胜利之后革命成果迅即丧失的原因。在这次会上，有的同志专门就湖北革命党人的局限作了说明。认为湖北革命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虽做得最为出色，但却仅注重于反满，这一严重漏洞直接带来了革命由胜转败的危机。

人物研究领域的扩大，是这次讨论会反映出来的特色之一。许多过去研究甚少的两湖人物已开始引起人们重视，对一些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从新的侧面进行了探讨。例如在“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湖北革命阶级分子居正，因其二十年代中期即坚持反共立场，一直失落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这次会上则有同志提交论文对其生平和思想作了详细论述。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名声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杨度，也有同志就其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地位、作用、阶级基础以及思想局限诸问题作了较为透彻的说明。有关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刘复基等革命志士的文章，一般都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或作进一步阐发，或提出不同意见，而论述曹亚伯、张国淦、宁调元、黄忠浩等人的论文，则一定程度地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上接第45页）

说李渔之戏剧供统治上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用则易为接受，把他说成是帮闲文人，是否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了。另外，李渔对戏剧理论和艺术上的贡献，如果把它的分量看得重一些，就会冲淡另一方面的评价。笔者以为强调他的积极面，或许论人更准确一些。何以对李渔苛刻了一点呢？是否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太强调对一个人的阶级政治定性了。写人物传记、人物评价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著作质量的根本问题。要达到精当无误的水平，作者除应有必要的学术修养，还特别需要对前人的学术遗产的鉴别能力，摈弃其不科学的成分，创造自己的学术观点。

（上接58页）

断代史和皇朝史的关系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既交流了学术，又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友谊，必将进一步推动清史学术研究的繁荣。